

太平天国革命思想潮流

彭澤益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平天国革命思想潮流

彭澤益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3 4 1 8)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彭澤益

上海河南中路

\*\*\*\*\*版權印有究必\*\*\*\*\*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印刷所  
各地農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 白序

國父少時，每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且深惜太平天國革命之功未竟。蓋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居首，實與昔之驅除匡復，主旨略同，此遺訓所以特加稱許者也。

湖當義軍崛起，億衆風從，易正朔者十四年，隸版圖者十四省，雖遭禁令，偉蹟罕傳，而革命思潮，影響於數十年後之民國，尙復若此其鉅，兩粵先進艱難締造之施，亦云遠矣。

彭君澤益爰綜中外史料，掇拾灰燼，以成是編，請序於余。念嘗躬詣桂平，按閱山川形勢，肅然致其嚮慕。今值抗戰建國之會，所資以闡揚主義，復興民族，益爲邦人當務之急。用述所得於遺數者，以冠其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白崇禎序於重慶。

# 朱序

太平天國研究之成爲一種新興的專門學問，實從孫中山先生爲漢公（即劉成禺之筆名）太平天國戰史作序開始。民族主義第三講考證會黨源流及洪秀全與會黨的關係，民權主義第一講解釋太平天國祇是民族革命，不是民權革命。這種並重史料考訂和史料解釋，顯然就是現在國內研究太平天國歷史兩大派的端倪。

就現在國內研究太平天國的成績來說：一派注重史料之考訂整理，一派則注重史料之解釋，兩派互有短長。即前一派注重史料的考訂，是其所長，而缺乏史料的解釋，是其所短；後一派注重史料的解釋，是其所長，而缺乏史料的考訂，是其所短。我們以爲太平天國史之研究，在史料之搜集和整理以外，更應注意史料之解釋。就前者而論，是屬於「記注」之學。太平天國史應該是一種專門的著作，應該是一種「撰述」之學。這就是說，在方法論上，應該注重歷史哲學的方法，去說明牠，去解釋牠。就後者而論，現在已成爲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種風氣，此類書籍也出了不少，大都是理論多而事實少。這就是說，祇知有史料的解釋，而不知從事史料的搜集，直接應用原始材料。在這樣貧乏的史料基礎之上，試問怎樣能夠建立科學的理論解釋，結果還是遷就事實，來完成他們空洞的理論？

我們的研究方法，則欲別開生面，綜合此兩派的所長，而去其短，主張將史料考訂和史料解釋，都看成一樣的重要，兩者缺一不可。即是以中山主義的太平天國革命觀爲依據。同時這也是我們多年來提倡現代史學運動努力之鵠的。

我們知道：治史方法過於注重史料，祇知搜集，而不知應用歷史哲學的方法來解釋，這和螞蟻之採集食物的方法相似，可以說是「螞蟻的方法」。反之，過於注重史觀，妄加解釋，而不知先從事史料之搜集，這和蜘蛛結網一樣，一絲一縷都從腹中吐出，在已有之外無所發明，可以說是「蜘蛛的方法」。嚴格說來，這兩者都

是真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方法。而真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方法，則應綜合此兩者，有如蜜蜂採集花蜜而釀成芳香甘美的產物一樣。這種一面搜集一面解釋的方法，好比就是「蜜蜂的方法」。若以「螞蟻的方法」爲「正」，「蜘蛛的方法」爲「反」，則此「蜜蜂的方法」即爲「合」了。

在太平天國革命史的研究上，既然有人做了一段「螞蟻」的工作，也有人做了一段類似「蜘蛛」的工夫，那麼所剩下來「蜜蜂」的工作，自然祇好有待於我們歷史科學研究者的努力了。

彭澤益先生新著太平天國革命思潮，其中所論多爲我們數年來共同從事研討的。他所用的方法，即兼有史料搜集和史料解釋的兩種長處，可算是真正「蜜蜂」的工作，爲前治太平天國史者所未曾見，甚喜其用力之勤，謹爲推薦。

朱謙之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於國立中山大學。

蕭序

余治近代史二十餘年，向主民族革命史觀，竊考自滿清入主，吾民受其牽制，忠義之士，奮力光復，屢起屢蹶，乃組織天地會以爲革命之集團，以「反清復汨」之口號，聯絡下級社會爲基礎。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於浙江，朱一貴林爽文起義師於台灣，胡秉耀鍾體剛發難於江西，歷時四朝，雖敗不旋踵，而東南數省隱然爲革命勢力所籠罩。洪秀全原爲天地會黨人，受其思想之感染，遂建太平天國十四年之偉業。然卒至於滅亡者，則數典忘祖排斥儒教爲之主因。蓋吾國文化胥不脫儒家之範型，儒家以「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之訓，昭示後人。秀全本一儒生，習而不察，反以天父神權之說，標基督教降凡之異，反對孔孟之倫常，擺脫會黨之窠臼，白石赤符之識，愚夫所惑；妖書閻羅之謗，士農共憤，否則曾左不出，清室命運不絕如縷矣。然太平雖亡，政權轉移於漢人，湘軍解散，勢力增殖於會黨，且鴉片之戰以後壓迫中國者，非滿清之支族，而易以外人之帝國主義。國父承洪氏之餘波，因會黨之贊助，致力民國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遺業未成，迄於抗戰，其對象雖一變再變，而吾民日在革命之潮流中蓋已近三百年矣。舉凡政治學術經濟社會之演進，無一不受此種潮流之影響，此近代史心之所在，實不容忽視者，淺人所見乃外形耳。卽以思潮而論，天地會標榜民族主義，立同門平等之規，有通財互助之誓，此洪氏之所以揭義旗，禁私有，爲社會主義作一先導也。國父幼年受太平遺老之教，以洪秀全第二自許，決志革命，組織機關，唯一同志曰鄭士良者，卽三合會首領也（均見年譜）。鄭氏之於國父，猶馮雲山之於洪秀全，而所謂「四大寇」者，乃如蕭朝貴、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耳。同盟會之宣言，署年「天運」，襲自會黨，所舉四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中國，平均地權」，卽後之三民主義，綜爲自由平等博愛之國民革命。此可見思想進步之跡，以先民固有之思想爲精神，藉歐美倡行之三種主義——民族、民主、社會爲內容。換言之，卽以民族革命進爲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實卽民族革命之又

一階段也。此種集大成之思想，非中華民國之國父不能有，其精神仍淵源於儒教，蓋孔子上承堯舜文周。下啓老墨名法，國父恢弘民族革命之偉業，承襲固有文化之遺產，而又遠遊國外，兼綜歐美人之學說，似復雜而實相成，似矛盾而實相生，乃吾國中庸文化之辯證法也。如不明此義，則不特不能知國父遺教之精神，亦且不能知吾國文化之眞諦。若近代民族革命之源流，更無論矣。倘以此詮衡太平天國之革命思潮，其承先啓後之功，自不待言。近二十年，國人研究太平史者接踵比肩，猶以「長髮賊」視秀全固屬淺陋，徒以革命家論秀全亦未近理。彭澤益先生爲湘中積學之士，著爲太平天國革命思潮一書，列舉其宗教思想、革命理論、以及文化運動，條分縷析，元元本本。而最後一章，述太平天國對於三民主義及社會主義之影響，中西并顧，爲此書對於研究太平史者之重要貢獻。雖原文余未讀，然以彭君之才之學，必能蕩藩籬而窺臺奧，此不僅彰洪楊之微旨，亦爲吾國民族文化及革命史上光榮之一頁，故樂而爲之序云。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銅山蕭一山識。

## 自序

太平天國革命自爆發的那天起，即引起世人熱烈的注視。如果從當時人的記載算起，太平天國研究已有八十年的歷史了。尤其最近若干年由於我們的史學家不斷努力研討的結果，已使它成為一種新興的學門；在史學研究領域中，開闢了一塊新的園地。但根據太平天國現有的研究成績和新發見的史料，是否容許作綜合的述說？答案若是否定的，那不消說，我是作了一次大膽的冒險了。

在開始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時，我並無意想寫成像這樣內容的一本書。起初本想對它底歷史作全面的考察，材料也搜集不少，終因戰時種種條件的限制，使這份工作難以如願進行。我也知道，此刻從事全史的研究，不免為時過早。後來遂轉向於文化專史方面的研討，想從「吉光片羽」的文獻中，探求出一個足以反映時代精神和具有承先啓後力量的革命思潮。在現有關於太平天國歷史的各種著作中，像本書着重它底思想文化論究的，自然還是一種嘗試。

太平天國的思想形態，大體說來，在政治哲學上充滿了神學的色彩，社會經濟形態上則為均產主義，一般觀念意識上則又帶有多分的革命精神。其中雖具有不少的幻想成分，然亦有從現實基礎上引發的。有進步性，亦有落後性。這些龐雜的因素，有些受了外來的影響，有些却是中國農業社會歷史的傳襲。構成這個矛盾的特質，無疑是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的影響。不過，從太平天國歷史發展過程上看，初期思想發展，其前進性確多於落後性，新生的活力壓倒陳腐的惰力；可是後來其中前進的因素逐漸消聲匿跡，而腐敗的因素及歷史的惰力，漸次擴展起來，所以太平天國的滅亡，並非由於偶然。

本書的寫作，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間在中山大學時寫的。全書初稿的完成，則是一九四三年在重慶的期間。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到了武漢大學。樂山自然環境很美，生活也比較清閒，就趁着一九四四

年暑假把它重新改寫一遍。迄今為止，前後刪改不下十餘次，仍然不能感到滿意。觀點大致沒有什麼改變，反而材料不斷的獲得，更幫助了我的論斷。

我很感激朱謙之先生、羅香林先生給我開始研究時的鼓勵和指導；程希孟先生、徐中舒先生、梁園東先生和楊東蓀先生對本書的懇切校正；汪詒蓀先生不僅給我極寶貴的教益，並且提供了不少的日文材料。白健生先生曾校閱本書初稿，和我作過討論。軍事理論一章，承他指教不少。他提倡太平天國研究的熱心，實在值得敬佩！蕭一山先生在太平天國史研究上的貢獻，久為士林共仰。本書中所引用的材料，一部分曾是他在外國辛勤的勞績。本書初稿寫成，因郵寄困難，曾經寄了一個提要向他請正；並承他為本書作序，尤為欣感！

印度友人沈蘇美先生(Mr. Sumal Sinha, M. A., Calcutta)在華研究期間(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因閱讀中國史籍上的困難，我會應他友誼的邀請，將本書的大部分為他講述一遍。他記有一份英文稿。這項工作通常是在晚間進行的，有時討論到深夜。謝謝譚英華先生的從旁相助，使我們很順利的有這樣一次交換意見的機會。

現在回想七八年來流動的生活，真是一串苦難的歲月。在任何一個地方，我沒有安靜的停居兩年以上。但也得感謝這動盪的時代，因為它使我在旅行中就便的搜集了一些可貴的史料。我相信，太平天國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將來史料要是有更多新的發見，也許可以使它底歷史完全改觀；或者可以把它底歷史研究的水準提到更高的階段。

彭澤益，一九四五年春，國立武漢大學，崇山。

## 凡例

一、本書着重太平天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一般史實，爲體例所限，不便詳述。間有必須參考的，皆附入註中，以供參閱。

二、凡書中參考前人成說及徵引史料之處，皆一一註出，以資徵信，藉表謝意。末附「徵引書目」，係以引用者爲限，俾便檢閱。

三、書中古今人名，不論師友或識者與否，皆直稱姓名；外人姓名之下，均附原文，但以初見爲限。

四、清人目太平天國爲「匪」爲「賊」，以今日視之，是多未合。本書中引用清人著錄，儘量避免此類字。如引賊情彙纂、平定粵匪紀略等書，皆以撰者張德堅和杜文瀾之名代之。

五、本書採用世界史觀點，紀年一律用西曆，下附清代紀元及太平新曆，以資對照。

六、本書序文排列之先後，除自序外，係以姓氏筆畫簡繁爲序。

# 目次

白序	朱序	蕭序	自序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特質	一	一	一
一 宗教革命性	.....	.....	.....
二 社會革命性	.....	.....	.....
三 民族革命性	.....	.....	.....
第二章 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思想	一五	一八	一
一 前期的社會政策與政治制度	.....	.....	.....
二 後期政治經濟思想的新趨勢	.....	.....	.....
第三章 太平天國的軍事理論	三三	一	一
一 軍隊的編制與特點	.....	.....	.....
二 訓練的理論與實際	.....	.....	.....
第四章 太平天國的宗教觀和倫理觀	四一	四五	一
一 宗教的教義與儀式	.....	.....	.....
二 宗教特色與外人反響	六六	六六	七四

三 倫理觀念與行爲 ..... 八〇

第五章 太平天國的文化運動 ..... 九七

一 儒教批評及影響 ..... 九七

二 文字和文學的改革 ..... 一〇六

三 反對偶像與剷除迷信 ..... 一二三

第六章 太平天國與中西革命 ..... 一二七

一 太平天國對於中國革命思想的影響 ..... 一二七

二 太平天國給予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反響 ..... 一三一

太平天國官書編年 ..... 一三九

徵引書目 ..... 一四四

#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

##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特質

太平天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農民革命。它的目的在求平等社會和統一的新國家的出現。它具有不少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並帶有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積極傾向。從歷史發展上看，是一樁空前的事，一個最有價值的革命運動。雖然是後來失敗了。

容閎曾經指出它在歷史上的地位說：（註二）

『太平軍一役，……其可稱為良好之結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由夢中警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觀於以後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等年種種事實之發生，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

這一段話顯然有文化和政治的內含。因為太平天國興起即為南方文化運動的開頭。（註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它給人們帶來不少的新希望和新覺悟。其後在思想上的啓蒙運動和在政治上的改革運動，都是經此導引而發展來的。

這次革命運動在基本上實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宗教革命的；第二是社會革命的，第三是民族革命的。現在依次論述。

### 一 宗教革命性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農民革命，都與宗教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正如張德堅所說的：「自古草竊之徒，多藉邪教，教以倡亂。」（註三）因為下層民衆受着客觀條件的限制，知識比較一般的落後，而有着深厚的宗教意識，並且與統治者的毒害的宗教相處於對立的地位。因此，在反抗統治者的意識時，也就採取了宗教的形式。永田廣志舉西歐、日本和中國的史例說：（註四）**

『例如在西歐的封建制下的農民戰爭、中國底太平天國之戰、日本封建制下的一向暴動中的農民反領主的鬪爭（固然一向暴動的場合有種種要素），縱然都是假藉着宗教旗幟，但那決不是證明宗教進步性的。推動農民鬪爭的是經濟的和政治的要求，這要求顛倒地反映在那當時處在宗教世界觀底無條件的支配下的農民意識中便採取了宗教的形式。而且就是在那場合，因為宗教作了農民反抗底旗幟，所以也就銳利地反對過既成的支配宗教。』

所以歷史上的農民革命，總是表現爲宗教戰爭。

不過，中國歷代的農民革命，其所受的宗教影響，不是道教就是佛教，而太平天國卻受着基督教的影響。這是由於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接觸後發生的結果，是它所處時代的不同所致。普拉特（Helen Pratt）在她著的中國及其未完成的革命（*China and Her Unfinished Revolution*）一書中寫道：（註五）

『這個叛亂不是沒有外來勢力的影響的。它開始於華南，而那裏的基督教會已經建立了幾年。叛亂的領袖洪秀全自稱天王，他宣佈了一種新的三位一體——上帝是父，耶穌基督是上帝長子，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衆暴動裏，常常可以看到的宗教狂的精神，把中國農民捲進了這個運動。』

太平天國革命帶有基督教色彩，而不帶有天主教色彩，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在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常以基督教爲摧毀封建制度的精神武器。這對於太平天國革命，在客觀情勢上可說是十分適合的。

既然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導源於西洋的基督教，那麼要說明這種淵源，首先對於新教在華傳教的歷史有略

## 加敍述的必要。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是改正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一七八一年 (乾隆四十七年) 生於英國諾森伯蘭 (Northumberland)。(註六) 他年輕的時候，即有傳道外國的志願。一八〇五年 (嘉慶十年) 倫敦佈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計劃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他便當選了。(註七) 那時中國海禁很嚴，不准外國人進入內地，尤其傳教。從英國到中國的交通權柄，操在東印度公司手裏，他們也不許傳教士乘搭公司的輪船，因恐傳教士來到中國影響到他們商業的發展。馬禮遜祇得繞道先到美國，乃於一八〇七年 (嘉慶十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啓程，經大西洋而至紐約，改乘帆船 (船名 Trident) 過太平洋來到中國。(註八)

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馬禮遜到達廣州，(註九) 祕密的寄居在一個美國貨棧裏，努力學習中文，生活方式也都仿效中國人，(註一〇) 後來感覺身體欠適，就赴澳門居住。這時東印度公司聘他為中文翻譯，(註一一) 他便一面辦公，一面翻譯聖經，往來於澳門和廣州之間，不但可以不受天主教的反對，並可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耽心。他這樣的工作一直到一八一三年 (嘉慶十八年)，由倫敦才派來一個叫米憐 (Dr. William Milne) 的同工。(註一二) 不料遭受官廳和公司的反對，不能在澳門廣州安身。米憐只好找到馬刺甲 (Malacca)，在那裏從事於刻板印書的工作。(註一三)

馬禮遜努力於翻譯聖經和撰述佈道文學，雇工刻板印刷，有使徒行傳、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說耶穌教法、以及舊約創世記等書，並進行編輯華英字典。當時幫助他做印刷工作的有一八一四年 (嘉慶十九年) 進教的蔡高，不幸在一八一九年 (嘉慶二十四年) 便死了。後來他的哥哥蔡亞興，弟弟蔡亞三都信了福音。(註一四) 還有一個叫梁發的，在一八一一年 (嘉慶十六年) 和一八一二年 (嘉慶十七年) 間，馬禮遜把路加福音和新約書信的大半付印，而這些書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他手。(註一五) 他們四人之中後來要算梁發做了一番偉大的開創工作，他在改正教歷史上佔着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國牧師。(註一六)

梁發俗名叫梁阿發，一七八九年 (乾隆五十三年) 生於廣東高明縣。他受過普通教育，會習三字經、四

書、五經。最初學造筆，後改學雕板，在廣州洋行街（亦稱十三行）即今長堤附近的一個印刷所裏工作。（註一七）因為雕印聖經的關係，得與馬禮遜接觸。他大概比馬禮遜小過七歲，曾經請求洗禮，馬禮遜沒有答應。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隨米憐離開廣州到馬刺甲，四月十七日放洋，舟行三十五日抵埠。（註一八）他替米憐雕印所著救世者言行真史記，受了感動。第二年十一月三日正午十二時，米憐為他舉行洗禮，（註一九）從此成了一個忠實的信徒。他在馬刺甲和米憐共事三年，相處很好，除了幫助他翻譯印刷以外，一八一八年（嘉慶二十三年）並襄助他創辦了一所英華書院，教育中國兒童。（註二〇）他更熱心的著了一本叫救世錄要略解，末附幾段經文三首聖詩和十誡，篇幅只有三十七頁，算是一本中國人自著的中文佈道書。（註二一）他把書稿帶到廣州給馬禮遜看，後來印成二百本，分送親友，却不料被官廳把他逮捕，釀成大獄。後經馬禮遜央求有力商人設法營救，罰金釋放。（註二二）

梁發回到馬刺甲後，仍然繼續幫助米憐雕印聖經，並努力福音的傳布。他感化了他的家庭——妻子和兒子都皈依基督。（註二三）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六月二日不幸那患難相共的朋友米憐因患肺病死去，他就回國來了。（註二四）

這時馬禮遜在華工作已經十六年了。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十二月間即想回國一行，但在廣州澳門間找不到適當的人選，來繼續傳教的工作，使他非常躊躇。恰巧梁發回來，見了格外高興，就封立他為宣傳士，這是改正教在中國的第一個牧師。梁發接受了這個重大的責任，益發努力傳教，並註釋了一部希伯來書，又作了一篇真傳救世文的短論。（註二五）這時中國官廳取締傳教和信教的法令雖是嚴厲，但是梁發勇往直前，一點也不畏縮，因此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羣中，宣講耶穌高道，斥責迷信，感動很多人。（註二六）

原先馬禮遜於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回到英國，兩年後於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九月十九日重返澳門。（註二七）在他們兩人通力合作之下，傳教事業日益發展。在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八月一日晚間，馬禮遜即死去了。（註二八）梁發感到同伴去世，覺得生命的短促，所以他格外努力，繼續那送書傳教的工作。恰逢這